

• 社会学研究 •

升学锦标赛、教育内卷化与学区分层

陈友华, 苗 国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 家庭子女数量锐减与残酷的升学淘汰机制导致城市基础教育陷入排位赛的内卷化竞争。基础教育难度低、知识更新慢、人才区分度不高,其教育分层更多依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择校”完成,而非学生智识水平及学业成长潜力。民众和市场基于理性选择对教育资源调控政策做出“制度再适应”,如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集体行动逻辑不发生质变,用教学硬件条件均等化、师资轮岗流动、“公民同招”等措施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努力很难实现政策的初衷。着力改变城市家庭“育独苗”的反常家庭形态,大幅提升生育水平才是缓解教育内卷化的治本之策之一。

关键词: 锦标赛体制; 教育内卷化; 少子化家庭形态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21)03-0055-09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基础教育排位赛与竞争内卷化愈演愈烈,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对天价学区房追逐与铺天盖地的课外补习班迫使政府不断加码减负与提倡素质教育。减负与素质教育日益成为教育调控的主基调,反衬出家长对子女教育焦虑的与日俱增。教育调控不断升级,受教者与施教者都不甚满意,甚至怨声载道,收益最多的竟是各种课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房产中介。然而,中小学课业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在课外

出现严重反弹,一线教师及教育管理者夹在求素质、减负担与拼成绩之间苦不堪言。^①与城市家庭教育压力陡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家庭因子女教育投资回报预期不高愈加走向佛系。两个极端反映出城乡二元体制下不同社会阶层对教育投入“成本—风险—收益”的认知偏差在不断拉大。城市家庭由于子女数量更少(多是独生子女家庭)与经济条件相对更好,易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策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普遍心态引发家庭教育投入竞赛,在全民参与、全民焦虑的推波助澜下,教育内卷化竞争产生了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

收稿日期: 2021-02-06

作者简介: 陈友华(1962—),男,江苏如东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的阶段性成果。

①学业负担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学业负担减轻与学业成绩提高很难同时实现;素质与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减负更可能导致学业成绩的下降,而学业成绩是素质的两大衡量维度之一,减负也未必能促使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因而减负未必能实现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而素质与学业成绩因果相连,不仅学业成绩是素质的重要衡量维度之一,而且通常情况下更多是相辅相成,即我们常说的“品学兼优”。因此,素质提升、负担减轻与学业成绩提高三者之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可能三角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促进均衡发展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学区制”作为中小学分片划区管理的一种基础制度,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管理机制与效能视角。“学区化管理”不同于以往一般化的“中心校式”的学区管理概念,更加强调“大教育”体系内部的纵横逻辑联系和结构优化,以获取更大效益为目标,进行一系列的人、财、物资源的调整^①。学区化办学具有成区域、高分享、重协同等基本特征^②。在具体做法上,上海努力构建“骨干教师流动蓄水池”机制,以学区内师资管理系统为媒介,促进骨干教师柔性流动^③。在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学区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联盟、集群和集团三种管理模式,但“学区管理模式实施中存在着教育行政政策单一、学区行政管理权有限、教育资源共享的管理阻碍等问题”^④。因此,在优质均衡视野下,有学者建言学区应更注重文化和精神资源的均衡配置,^⑤促进学区内学校从“差距合作”走向“差异合作”,形成以教育质量为导向的学区考核评价方式^⑥。但很显然,教育质量评价一直是学区考核评价的重点、难点与痛点,现实远比理想骨感。随着国家“就近入学”、“师资均衡流动”等公平导向政策的不断深化,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更加高涨,升学率评价作为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最重要指标,^⑦突破升学指挥棒的各种尝试多以学生家长的制度再适应加以应对,结果是理想主义实践往往以“不了了之”而收场。在大力倡导教育公平和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学区制给义务教育学校和教师带来大好机遇,同时也极大地挑战教育管理部门跟进配套措施的能力。

二是教育公平视角。尽管多数研究者认为学区管理模式有助于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但亦有不少研究者坦言,在城市内部出现的学区房现象是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稀缺与人们旺盛的教育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矛盾引发的新表现^⑧。陈培阳梳理了国外教育设施与社会空间分异关系的研究热点,分析了中国城市教育设施不均衡及其引发的学区绅士化现象,认为学区绅士化现象存在值得思考的负面效应与社会风险,包括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俱乐部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格局与居住空间不平等格局的加剧^⑨。杨振山等认为学区、学校、个人及政府间复杂的博弈关系最终导致了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和居住空间分异的加强^⑩。这些都显示出中国社会治理所要面对的现实的复杂性,政府调控很多时候无法预知市场机制驱动下的群体行为。同时,政策执行过程中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政策执行的结果,如执行机构、执行环境、被执行群体的态度与应对策略等,导致实际教育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总是存在许多不足,有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甚至会起到相反作用。

三是教育资本化导致的社会分层视角。学校质量资本化研究源自蒂伯特(Charles M. Tiebout)提出的区域公共品供给模型。教育设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均衡分布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之一,“以房择校”成为家庭基础教育投资的主要载体,“教育质量资本化”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普遍兴盛。倪娉婷认为学区房与优质教育资源挂钩,意味着教育竞争从学生的学习能力转向了学生家庭经济资本之间的竞争,反映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⑪。教育分层甚至产生了明显的财富分层效应,冯皓与陆铭基于上海市52个区域的房价与学校分布的月度面板数据以及“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命名的自然实验表明,区域间在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已经部分体现在房价上^⑫。毛丰付、罗刚飞、潘加顺基于杭州市主城区202个校区住房数据研究了优质教育资源

①文化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根植于特定的土壤,虽然文化可以移植,但短期移植的难度很大。因此,文化和精神资源的均衡配置难度很大,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②与经济领域的GDP一样,高中及以下阶段的升学率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最重要与最核心的不可替代的指标,尽管这一指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离开升学率指标的教育质量评估都是罔顾事实与不负责任的。

对学区房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杭州市区重点中学周围学区房溢价超过小学^[1]。王永超与王光宇等选取沈阳市中心城区53所重点中小学所对应的321处学区房,以82处非学区房作为对照组,利用价格特征模型得出结论说学区房成为房地产紧缩调控中的特例,“政策管控效果不明显,其他房价影响因素在学区房上被弱化”^[2]。无论地域如何,学区房价格普遍相对较高已成为普遍现象,当然,这些实证研究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认知学校教育质量的内生性。事实上,基础教育阶段比拼的是基础教育质量,而基础教育质量是以升学率来衡量的,而升学率的背后比拼的是生源质量。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通常会选择周围环境较好、资源富集的社区居住,这些社区由于资源富集而房价相对较高,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具有社会经济上的优势,不仅其生育的子女身体健康状况与天资相对较好,而且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与成长环境,因而其所在学校更可能造就优异学业成绩,名校因此而诞生并得以延续,并形成马太效应。因此,学区房的高房价不仅是优质学校资本化的结果,更是优质家庭区域聚集的后果,西方国家的学区房形成机制多是如此^[3]。只是在目前的制度约束下,国内公立学校无法对进校生进行质量筛选,民办学校拥有招生自主权的制度优势,在过去十年间,私立学校依赖这一制度优势通过择校生获得了非对称优势,发达地区私立中小学发展得更好就是明证。因此,中国的学区房形成机制以及教育内卷化表现与西方国家又有所不同。

简言之,公平作为基础教育追求的核心价值,毋庸置疑受到各方拥护,但严谨的择校、学区与教育内卷化相联系的研究非常少见。笔者认为基础教育“有教无类”、“公平优先”的理想主义在升学重压下多沦为空谈。譬如,政府基于公平诉求制定的“就近入学”政策,初衷自然是好的,但“就近”只反映表面上的公平性。在

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以及就近入学管制情况下,民众会基于自利本性与市场基于利润最大化和自由交易诉求,对政策进行“再适应”。购买学区房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应对之策。教育资源分配通过房产交易与家庭财富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严重的择校及学区房溢价问题。“择校热”迫使官方出台更多的公共资源均等化调配举措,如“多校划片入学”、“公民同招”等。类似市场经济领域经常出现的企业兼并重组等现象在教育领域不断上演,名校通过横向兼并和纵向新建两种方式实现大跃进式扩张。与此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严禁采用升学率指标考核基础教育,严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状元”、“高分考生”,甚至连课业成绩公布都成为禁忌。但家庭优质教育需求不断高涨与优质教育资源短时间内难以急速扩张的情形下,“多校划片入学”、“公民同招”等供给侧内部结构再调整只是增加了家庭选择的不确定风险,并未让教育公平理想得到贯彻,反而使得利益相关群体的焦虑进一步升级与蔓延,加入一场又一场新的教育排位赛之中。

三、基础教育内卷化的根源

重视教育是东亚社会的重要传统,也是教育内卷化的文化根源。接受优质教育从娃娃抓起已成为一种文化“惯习”(habitus)^①,在学业减负频频出招、教育均衡大力推动情形下,基础教育在中低年龄段的竞争愈加激烈,家长因“惯习式”卷入形成了一套“激励扭曲”的教育锦标赛体制。这套饱受诟病但各方又不得不屈服的体制得以存续的根源在于:残酷的升学机制叠加严重的少子化家庭形态,在这一前提背景下,城市家庭子女由一个学龄阶段到另一个学龄阶段,必然有个体掉队,对子女数萎缩到极致的现代城市家庭,与升学率互补的是淘汰率,“育独苗”家庭形态让升学政策划定的每个1%都是极其残酷的1%。

^①布尔迪厄将惯习(habitus)定义为“持久的、可转化的倾向的系统,结构化的结构,预设结构化结构的功能”(1992:53)。董泽芳(2015)认为“惯习”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不断演化的社会环境中养成的某种能力习惯与性情系统,是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基础教育锦标赛体制形成的某种文化惯习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在同时发挥作用。

基础教育“择校热”在中国大、中、小城市均较为普遍,哪怕子女的学业成绩并未因优质学区而有丝毫改善,但投资学区房却能从中获得不菲收益,这已形成极强社会示范效应,击鼓传花式的教育资源争夺竞赛短时间内难以因学区政策调整而发生根本性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学区政策的大幅调整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与社会风险考虑,政府的学区政策调整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式渐进式变革。与此同时,个体家庭决策也不再只是为了跨入名校利于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开始掺杂更为复杂的行为动机:如家庭资产保值增值需求、子女社交圈层建构需求,家庭经济地位提升或保全等全新欲望。除非需求端发生重大变革,供给端的渐进式缓慢均等化动作很难降低人们对“优质资源”争夺的动力。本质上来说,升学导向的教育竞争是导致教育内卷化的根源。

内卷(involution)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是在总结爪哇岛农业经济发展特征时提出。黄宗智(2000)把小农家庭在面对生存压力时,对农业大量投入劳力,在边际收入持续递减甚至为零时仍然继续投入劳力的现象称之为“内卷化”。所谓“教育内卷化”则是指由于总体收益锁定(升学率锁定),为获得有限教育资源,由竞争方式同质化导致同年龄段学生、同类型教育机构、同时期家长之间展开激烈而无效的竞争,在个体边际成本增大的情况下,出现边际收益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形。在内卷化模式下,家长是无辜的,孩子是无辜的,学校也是无辜的,教育管理部门也是无奈的,但在升学指挥棒引领甚至是控制下的教育内卷化又是难以避免要发生的,这种个体理性驱使下的群体非理性竞争正是在全球蔓延的“教育悲剧”。

首先,“望子成龙”是所有家庭的正常心态,“自私的基因”决定了没有家长会乐意自

家孩子过早掉队,尽可能多地投入家庭资源是每个家庭的理性选择,以学区房择校或高价进入私立学校为手段,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因此而聚集,这类家庭往往更有财力与精力投入家庭教育竞赛,形成“正向反馈”,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家庭阶层选择差异所形塑与固化。

其次,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本不应该承受如此巨大的学业压力,这不仅违背了青少年的成长规律,也容易诱发各种身心健康问题,也不利于高等教育选拔合适的可塑之才。基础教育排位赛迫使基础教育阶段甚至学前阶段学生不断简单重复已学知识,以便应对单一的升学考试,熟能生巧式的内卷化灌输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与对新知识的渴求锐减,普遍产生了厌学情绪。一旦学生从父母与中小学长期双重压制下脱离出来进入高等学府,则很可能蜕变成脱缰的野马而“自由发展”,草草应付学业,以至于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者越来越少,综合素质、特别是专业素养严重下滑。而身处其中的高校与教师出于自保考虑多不敢严加管束,以防“引火烧身”,“糊混”、学校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重放水”^①构成当下某些高校的普遍生存样态。

再次,对学校管理者来说,利用品牌优势招到优质生源,甚至采取封闭式集中管理方式打造“考试机器”,放大名校光环,保持自身品牌的良性循环是最理智的做法。若不能及时加入教育锦标赛,一次落马可能意味着满盘皆输,^②学校之间内卷化竞争日益加剧,教育管理部门也是异常无奈。

总之,学区房热并非政策制定者有意为之,官方也无法改变“望子成龙”的家庭心态。无论教育资源如何配置,家庭总会在理性选择驱使下利用市场机制尽可能地获取优质资源。同时,升学一定会牵扯到学业评价,有了评价自然就有优胜劣汰,社会制度也无法推行去升学化

^①目前情况下,教师多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害怕学生给予差评、打击报复甚至轻生等极端事件的发生;而学生给予教师“好评”,以换取“好成绩”,进而在未来升学与求职竞争中抢占先机。师生之间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重放水”中获得各自所需要的东西。

^②南京市某著名中学,一所传统名校不搞应试教育,升学率大跌,家长围堵学校大门逼迫校长下课,最终政府相关部门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对学校管理层进行了调整,校长被撤换。

的评价机制。或许,极致的教育内卷化只能通过极低的生育率来满足人人都能升学的教育幻想。现如今,东亚发达经济体基本可做到人人都能上大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甚至会因生源不足而走向破产关门。在这些国家与地区,问题的焦点由能否上大学演变成能否上好的大学,而好的大学永远是少数,因而高等教育扩张也满足不了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渴望。教育资源配置最终起到“计划生育”效果,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少子化危机。

四、学区房及其形成机制

如果说高等教育竞争考察的是真正的学业能力水平,基础教育竞争则主要是家庭条件的比拼。优质生源逐渐聚集到名校,朋辈群体间的相互影响与激励效应,以及家长的监督、陪伴、以身作则与课外辅导等,优质生源不仅让名校学风好、施教易,同时教师与学校管理团体的信心与能力也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导致教育质量也不断巩固甚至提升,并在激烈的学业竞争中遥遥领先,马太效应因此而形成。可以这样认为,基础教育的名师多出现在名校,并非仅仅因为老师教得好,更主要是因为名校生源好成就了“名师”。而教育资源供需不均衡以及升学机制所限,不可能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进入名校学习,“育独苗”少子化家庭形态导致城市家庭选择学业以外的其他竞争路线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家长们秉持教育至上的理念,学区房就成了当下解决孩子入学进而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最主要通道。

学区房构成一种社会分层机制,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西方国家同样有学区房,但中国与西方的学区房形成机制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学区房的形成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重点学校的设立,二是划区就近入学的制度安排。前者,传统的重点学校往往由强势组织与强势群体背书,政府机关、高等院校、知名企业等因工作人员福利需要开办各类附属学校,这类学校在师资及硬件条件上拥有“先天”优势,公众趋之若鹜过程中,吸引外部优质生源加入形成

“马太效应”,但这类名校多位于老城区,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堪忧,吸引优质生源的潜力面临代际认同的挑战;后者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新城区高档商品住宅密集成片区域逐渐形成一些“后天型”学区房,相比前者糟糕的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新城区舒适住宅区形成的新教育品牌对年轻人更具吸引力。乃至老城区的传统名校都通过各种方式(跨区联盟、直属分校、教育集团民营化等路线)向新城区转移。无论是先天型还是后天型学区房,择校管制和就近入学是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购买名校周边住宅是城市居民获得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个体应对策略,选择去高价私立民办学校就学是次要渠道。无论哪条道路都对家庭经济实力构成考验,学区房已经成为家庭竞争力特别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已经不是孩子之间单纯的个人能力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家庭之间的竞争,代际的竞争,甚至是全面竞争”^[4]。相比之下,Tiebout的居住群分理论指出国外居民根据各自的偏好选择各种公共产品,从而选择居住地,最终具有相似偏好的群体会逐渐聚集在一起,导致相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空间上出现聚集^[4]。因此,西方的学区房多属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衍生物,由市场化的居住分层自然形成,难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同一学区的背后是相似社会阶层家庭孩子的空间聚集,而不同学区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阶层家庭孩子的空间分野。这也使得西方社会的优质学区房往往伫立在整洁富丽的富人区,而中国的学区房多是老城区简陋不堪的“老破小”,这种巨大反差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可能正处在质变的前夜,向西方学区房形成机制靠拢是中国城市学区房空间演进的必然趋势。

五、基础教育质量及其决定因素之一: 师资及其内部差异

教育学研究结果显示:学校对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主要通过教师质量、学校环境、家长参与、师生互动与同群效应五种机制来实现^[5](pp254-258)。人类长期积累的经验表明,基

基础教育知识迭代速度较慢、难度不高,因而相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基础教育阶段对师资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等要求不高,但对教育技巧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至少在大城市,各学校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之间的水平与能力差距不是很大。更为重要的是,师资力量再强也无法突破教育大纲圈定的范畴,用何种技巧进行知识传授成为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

再者,基础教育阶段还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人人都必须接受,而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差异还很大,要求大家普遍接受的知识一定是接受难度较低的基础性的简单知识,对人的智商要求不高。因而人才区分度不高,甚至早期阶段根本没有学业潜力区分度,过去基础教育阶段师资水平之间的差异很大,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基础教育阶段各学校师资水平之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现如今,至少在大城市,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都是接受过正规的大中专教育,甚至越来越多的接受过研究生教育,最终比拼的不是教师知识的传授能力,而是生源质量与教育机构的管理风格。二是知识更新慢,基本上是简单重复。公立学校因在校时间控制与减负要求,重复训练不足,因而在升学评价中不占优势。而民办教育施教灵活,可以课外加餐辅导,因而具有某种优势,再加之在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可以筛选学生,生源质量与生源家庭背景相对较好,因而相对于公办学校更易出成绩。上海基础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在经历短时间发展后普遍碾压公办学校就是明证。三是经过多年发展,基础教育阶段各学校之间的硬件条件差距急剧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方法与教学技巧的重要性逐渐显现,而课外辅导班可以更好地填补公办学校这方面的不足,学生课业成绩除天赋外,课外辅导班价格昂贵,因此,基础教育最终还是演化为家庭投入的比拼。

因此,中国的教育名师多来自名校,实际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把优等生继续培养成为优等生是本事,但把普通生培养成为优等生更是本事。真正的教育名师不仅应该出自名校,而且更应该出自普通学校。很显然,普通学校因生源质量受限,在目前这种教育锦标赛体制下

普通学校出“名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确可通过优秀师资流动与硬件设施均等化努力缩小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然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际的政策效应并非如此。一方面,任何资源调配不可一蹴而就,师资与学生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问题,调动优秀师资不一定能真正提升学校的质量,尤其在短期内更是如此。同时,教育活动本身十分复杂,在学校层面发生的任何外生干预都需要克服教育系统的固有惯性,学生学业成绩或其他微观产出上的效果需经历长时间的积淀。综上所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集体行动逻辑不发生质变。用教学硬件条件均等化、师资轮岗流动、“公民同招”等举措来保障教育公平的努力很难实现政策初衷。

对比之下,中国农村子女教育焦虑相对较轻:一是农村家庭结构较为正常,独生子女家庭占比较低;二是农村家庭受资源限制其子女教育投入相对较少,对子女的期望也相对较低,生存技能的掌握而非一纸文凭更被认可。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城市的少子化家庭多是“伪中产”家庭,他们整日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抱有深刻的危机感,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一步向上流动或至少继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太快,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洗牌”。更深刻的因素是“伪中产”底气不足:上层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足够高,在向下传递过程中即使有所折损,下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依然相对稳固;底层民众通常盼望重新“洗牌”,让自己换换“手气”。只有中产阶级匮乏核心资本,“一手好牌”被洗掉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患得患失,进退失据。事实上,城市家庭一旦选择少子化家庭形态,与农村多子女家庭相较,“质量换数量策略”可能已在代际阶层传递方面输在起跑线上。

如图1所示,随着少子化家庭形态的固化,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在“划区就近入学”且基础教育质量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优质生源通过名校掐尖进一步聚集,尽管普通学校与名校的硬件差距与师资力量在急剧缩小,但生源质量差异却在不断扩大。花巨资购买学区房的背

后,不是所选择的学校和教师究竟有多好(当然这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更多是选择同学及背后的家长,特别是那些愿意为孩子的成长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顽强拼搏与辛勤工作的家庭。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贪玩的天性与学业难度的不足,仅仅依靠孩子的自觉性,在升学排位赛中胜出多是不太现实的,背后家长的督促、陪伴、课外辅导甚至以身作则,以及朋辈群体的相互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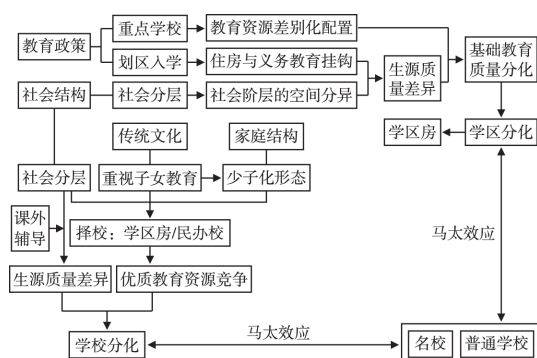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结构、教育政策与基础教育学校马太效应的形成

卢宇通过考察发现,购买学区房的人群在年龄、学历、收入、落户过程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基础教育的教育分层愈来愈依赖家庭经济地位通过购买“学区房”或“民办校”的方式“择校”而完成。^[4]我们不能否定与抹杀师资等外部条件的价值与作用,但不宜颠倒这一根本关系,无论是中国的学区房还是西方的学区房,学区背后的本质是生源,而生源的背后是家庭,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其成长环境与父辈对子辈的期盼、培养目标与教育投入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全国各级学校,全部参与到对生源的争夺战之中。而张浩、李仲飞等认为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存在“沉淀效应”^[5],即区域内沉淀的教育资源越丰富、时间越长,相应的房价也会越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沉淀效应会更加明显。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沉淀效应的可持续性。因为中国的学区制度正面临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一部分计划经济时代的存量优质学区资源正受到周边社区衰落的挑战,必须谋求转型发展,对于城市新中产家庭来说,

搬离“老破小”社区,进入“新好大”社区才是出路。实际上,南京等地的名校正通过在新城区建立分部等形式逐渐搬离老城区。另一部分新贵由于城市扩张以及教育资源流动,形成崛起态势,但在“公民同招”调控影响下,学区房的走向并不明确,有迁徙能力和选择资本的城市居民如何应对政策调整,并做出何种“制度再适应”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六、结果与讨论

(一) 结果

从“择校”到“择房”,其背后所隐含的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由单一因素向多元因素演进。当教育供给无法满足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时,有能力的家庭会“用脚投票”,搬迁到其他能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同一学区内部家庭之间的社会阶层开始趋近,社会阶层分化甚至阶层割裂通过教育分层与居住空间隔离得以进一步强化,学区房也逐渐演变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高收入和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流动和缺乏搬迁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的留守将成为难以撼动的社会演进趋势,不仅对城市人力资本、税收、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等产生长远影响,教育资源分布极化也在加速城市“藩篱”的形成。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大转型时代”的困境主要在于“人类的行为动机不仅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且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同时这种自我社会地位、权力与资产的维护意识是由代际内部转向代际之外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子女教育焦虑症爆发的底层逻辑之一是少子化家庭导致严重的阶层代际传承焦虑。不仅是中国,西方国家对学区房的追逐与子女升学焦虑也有愈演愈烈态势。由或明或暗升学指标框定的教育排位赛体制,让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内卷化,多数人只是在相互踩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从孩子呱呱落地便开始投入一场漫长的教育排位竞争中。

经济快速增长、财富大量积累、社会整体向上流动与少子化趋势,使得代际传承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挑战。代际资源传承压力是现代家庭教育焦虑困境的根源,而多子女常常与传统和贫穷相联系,社会流动率低,“子承父业”是社会常态,阶层跃迁很少出现,因而对子女教育的焦虑程度低与投入少。现如今,子女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家庭投入不仅包括物质层面,还包括人力和精力层面,城市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质量替代数量”策略不仅使城市在“低生育率陷阱”中越陷越深,更加剧教育内卷化。户籍与房产至今仍成为公共资源分配的载体,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就近入学”政策在现实中不仅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同时还恶化了少子化家庭形态。减轻普遍的教育焦虑的治本之策之一,在于鼓励生育,改变“育独苗”的不正常家庭形态。

(二) 讨论

教育资源均等化配置是政府努力为缓和社会分化矛盾,防止阶层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举措。基础教育质量评价“强调分数和升学率”并未因制度改革而根治,只是变得更加隐蔽化。面对升学与分数,生源对一所学校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与决定性的,好的生源的背后意味着好的家庭群体与高的社会阶层,条件优越的家庭更愿意也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参与到教育内卷化竞争之中。社区内部成员的同质化与社区之间成员的异质化趋势,意味着来自同一社区的孩子的家庭经济地位相近,这些孩子可称之为“同侪群体”。而以往同侪群体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关注与强调不够。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所有资源分配,“就近入学”还能保障一部分社会经济地位相差较大的群体共处一校,最近20年,房地产市场化发展,使得不同家庭的社会阶层鸿沟叠加日益明显的城市空间分异,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同处一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即便新城发展突飞猛进,简陋衰败的老社区还能因学区因素保留部分人气,但不久的将来,通过市场筛选,西方式的贫民区与富人区之间出现的严重空间隔离正逐步在中国的城市上演。

基础教育内卷化竞争形成机制的背后是群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式的诉求与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中国是一个具有职业歧视、身份歧视、制度歧视与文化歧视传统的等级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观点浸润到国人的骨髓之中,短期内难以改变。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人们总是基于个体理性对政策介入与社会制度做出某些“适应性”创新,即俗话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残酷而无实际意义的教育内卷化竞争未必会对教育调控做出“正面”回应,就像政府基于教育公平诉求制定“就近入学”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公众和市场基于自己的理性选择,通过学区房追逐对政策做出了解构与重塑,“按下葫芦浮起瓢”在公共治理领域屡见不鲜。

一个频繁调整的政策绝不是好政策,甚至暗示政策努力的方向可能出现了问题。以压制需求、控制供给为代表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就是其典型,屡调屡涨以至于民众产生逆反的心理预期。在教育资源调控方面,道理也是相通的:政策是死的,人是灵活的,任何政策制定与调整不仅有成本,更充满风险,随意与频繁调控所制造的人为风险甚至会带来“双输”的局面。宏观调控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群体需求,而任何公共政策操作都具有反身性,稳定的政策预期比信心更重要。近期,不少城市又开始施行中小学“公民同招”政策,试图在教育领域通过实施“国进民退”,促进施教均衡。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政策介入的反身性(theory of reflexivity)值得施政者做前瞻性预判。

参考文献:

- [1] 胡中锋,李甜. 学区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J]. 教育导刊,2009,(7).
- [2] 郭丹丹,郑金洲. 学区化办学: 预期、挑战与对策 [J]. 教育研究,2015,(9).
- [3] 房才桐,田爱丽. 学区化办学过程中骨干教师柔性流动机制探析 [J]. 教师教育研究,2019,31(2).
- [4] 蔡定基. 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学区管理模式现状、问题及建议——基于广州市越秀区的调查分析 [J]. 教育导刊,2012,(4).

- [5] 胡友志. 优质均衡视野下义务教育学区化管理探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12, (4).
- [6] 黄道主, 许锋华. 扣问教育公平——从学区房现象谈起[J]. 基础教育, 2010, 7(11).
- [7] 陈培阳. 中国城市学区绅士化及其社会空间效应[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8).
- [8] 杨振山, 栗子林, 丁悦, 等. 学区化外部性对城市空间的影响[J]. 人文地理, 2018, (4).
- [9] 倪婷婷. 从布迪厄资本论视角探析“学区房热”现象中的教育公平问题[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7, 33(12).
- [10] 冯皓, 陆铭. 通过买房而择校: 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J]. 世界经济, 2010, 33(12).
- [11] 毛丰付, 罗刚飞, 潘加顺. 优质教育资源对杭州学区房价格影响研究[J]. 城市与环境研究, 2014, (2).
- [12] 王永超, 王光宇, 董丽晶. 教育资本化背景下学区房溢价水平和价格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沈阳市中心城区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20, 26(1).
- [13] Black, S. E. Do better schools matter? Parental valuation of elementary educ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2).
- [14]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 [15] Schwartz, A. F. Housing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Data, 2010.
- [16] 卢宇. “学区房”择校背景下“就近入学”政策的解构与重构[J]. 学理论, 2015, (4).
- [17] 张浩, 李仲飞, 邓柏峻. 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与房价——我国教育资本化现象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4, (5).

责任编辑 黄 杰

Enrollment Tournament, Educational Invol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School District

CHEN You-hua & MIAO Guo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sharp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f modern urban families and the brutal mechanism of selection for further education have led to the involuntary competi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tournament” style. Due to lower knowledge difficulty and distinction, slower update of knowledg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basic education is more dependent on the family’s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through “school selection”, rather than students’ intellectual level and academic growth potential.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market can make “institutional readjustments” to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s.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ensure education fairness through equalization of teaching hardware conditions, the flow of teachers, and “equal recruitment” face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policy intentions. The logic of group action based on group division has not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 and the school district regulation policy of basic educatio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Focusing on changing the abnormal family pattern in urban families, greatly improving the fertility level, these acts constitute part of the root solution of alleviating the involution of education.

Key Words: competition system; educational involution; lower birthrate family pattern